

#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 玉器精粹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文物出版社

# 目 次

##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

——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 ..... ( 1 )

一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新发现 ..... ( 1 )

二 积石冢式山陵与玉葬之礼 ..... ( 16 )

三 神的世界与礼的升华 ..... ( 29 )

四 融于自然景观的遗址群体 ..... ( 36 )

五 五千年古国的象征 ..... ( 39 )

图 版 ..... ( 49 )

图版目录 ..... ( 101 )

#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

## ——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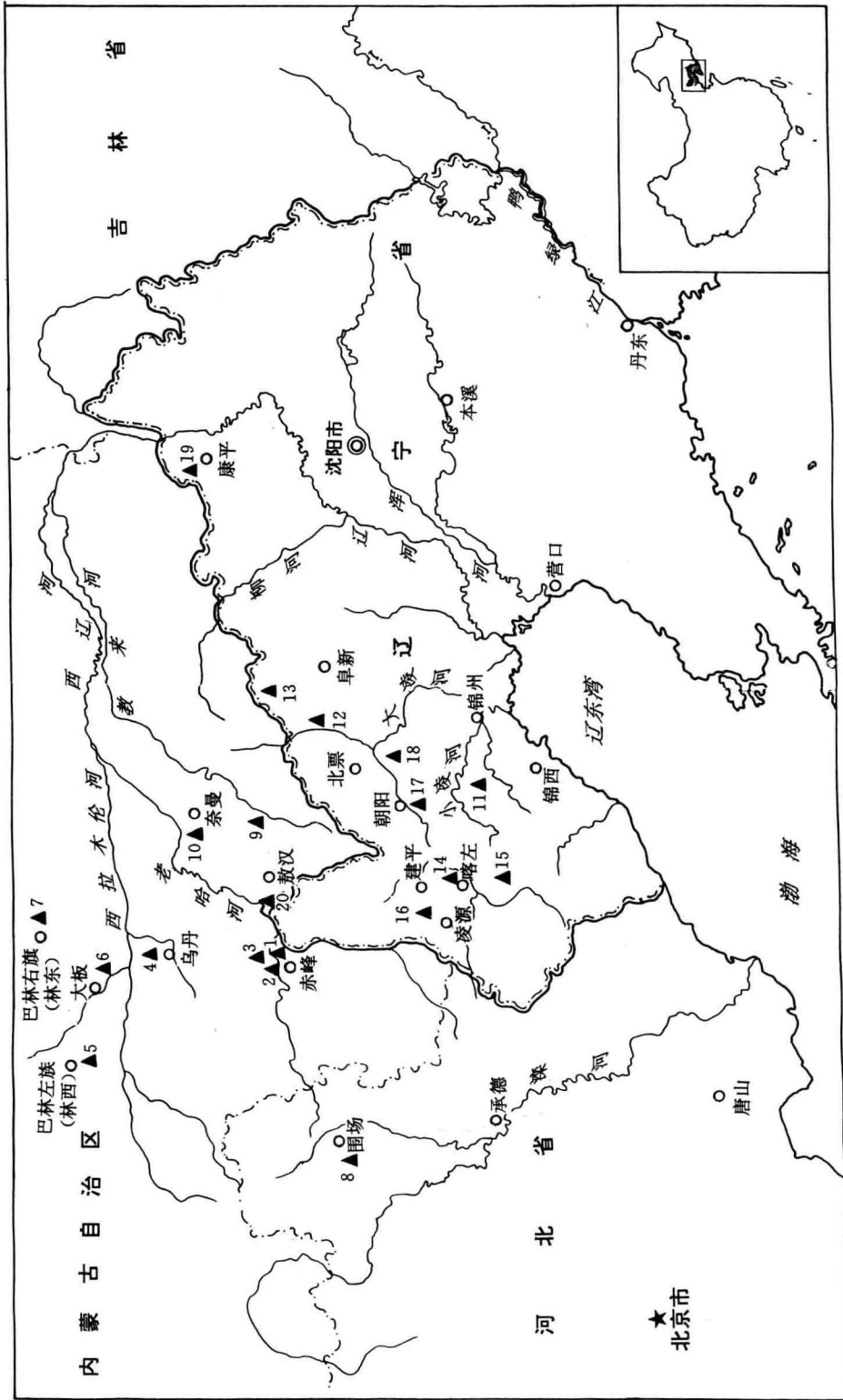
郭大顺

牛河梁遗址从1981年发现至今已有整整15个年头了。这期间，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遗址面貌被逐渐揭开，海内外学者也纷纷到实地考察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特别是近年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持续深入，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放，因而有可能从更为广阔的角度不断加深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

### 一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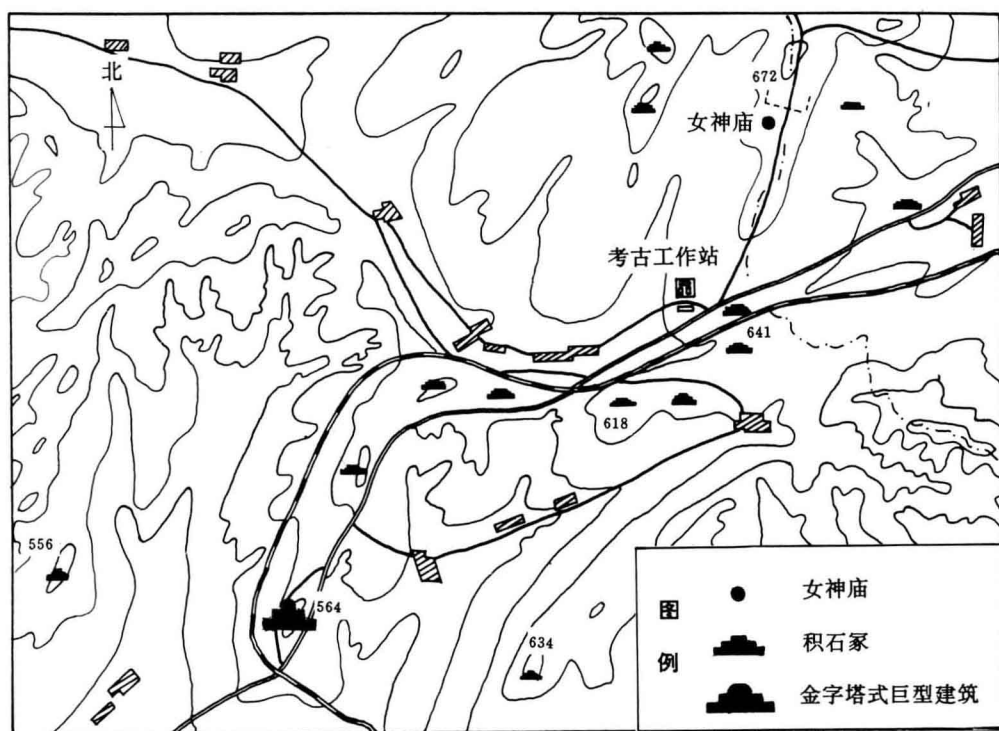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由于它处于努鲁儿虎山的山谷间，由东北向西南的走向与山谷一致，所以虽为山区，却并不闭塞。京沈公路，锦（州）承（德）铁路从遗址两侧通过，建平县城和凌源市区分别在遗址东西各15公里处（图一、图二）。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一带就不断有考古工作者的足迹，但直到80年代初，此处遗址才被正式发现，这里才有了连续不断的考古工作，这是认识指导实践的结果。这还要从红山文化的发现史说起。

红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1908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内蒙古东南部的林西县和赤峰县英金河畔调查，曾发现红山文化遗存。从1919年起，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也在内蒙古东南部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间曾到赤峰市东北郊的红山前作过调查<sup>①</sup>。早期对红山文化所做的工作，较重要的还有以下三项：一是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掘，二是红山后遗址的发掘，



图一 重要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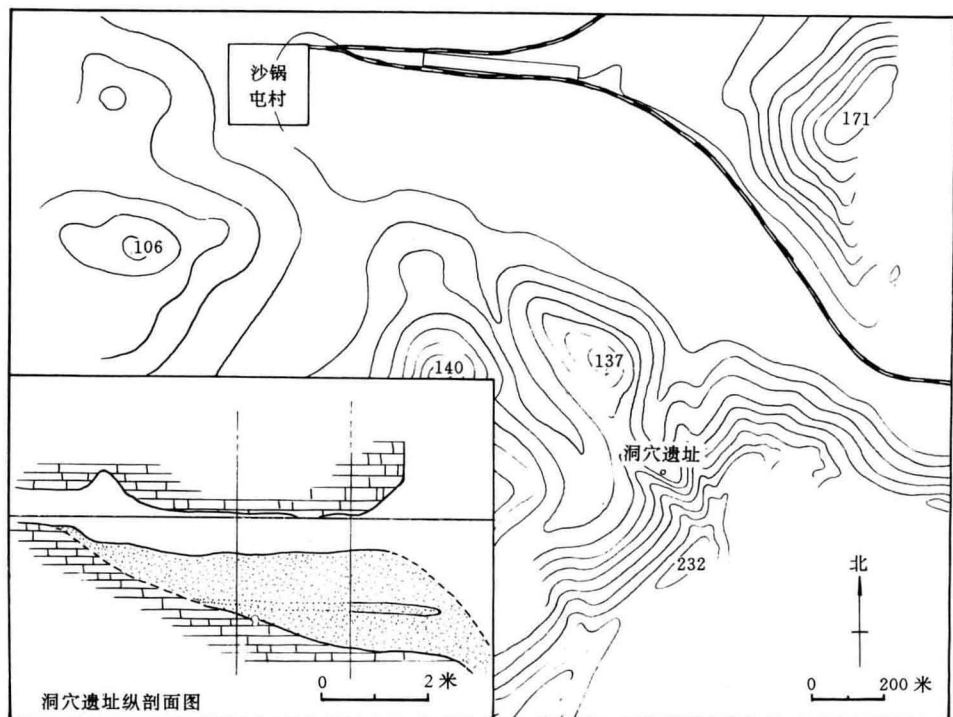
1. 赤峰红山后 2. 赤峰蜘蛛山 3. 赤峰西水泉 4. 翁牛特旗三星他拉 5. 林西沙窝子 6. 巴林右旗那斯台 7. 巴林左旗城郊 8. 围场下伙房 9. 敖汉下洼 10. 奈曼旗 11. 锦西沙锅屯 12. 阜新胡头沟 13. 阜新福兴地 14. 喀左东山嘴 15. 喀左新营子 16. 牛河梁 17. 朝阳十二台营子 18. 北票白石水库 19. 康平城郊 20. 小河沿



图二 牛河梁遗址群布局图（图中数字为海拔高度）

三是林西县和英金河流域的调查和研究。

沙锅屯遗址位于辽宁省锦西市（现葫芦岛市）南票镇沙锅屯村东南 1.5 公里处。洞穴在山坡南部，海拔 216 米，洞口方向为南偏西 35°。洞的规模不大，洞口宽 1.8 米、高 1.5 米、洞进深约 5 米。洞顶为较整齐的圆弧状顶，洞底稍低于洞外地表（图三）。沙锅屯洞穴是 1921 年 6 月被发现的。当时应聘来华进行矿产资源调查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这一带进行煤矿调查，顺便收集地质学、考古学方面的资料。他在南票煤田附近发现石灰岩洞穴数个，沙锅屯洞穴即其中之一。其后，他对洞内堆积进行了发掘，并于 1923 年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发掘报告<sup>②</sup>。据报告，洞内堆积可分为 5 层，采掘遗物主要属于新石器时代，计有石刀、细石器、石环、石兽形饰、骨锥、骨针、饰压印之字纹和绳纹的夹砂灰陶筒形罐、彩陶折腹盖盆、红陶双耳壶等。在洞内还发掘出代表 42 个个体的人骨。报告推测这个洞穴非古人居住地，而是一处祭祀址。据考证，安特生是在发掘完沙锅屯洞穴遗址之后转而南下，于同年 10 月发掘著名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这样，沙锅屯洞穴遗址就成为中国近代田野考古中第一次经正式发掘的遗址<sup>③</sup>。50 年代，因分析出该遗址出土的鬲形陶器片时代较晚，进而对当时发掘中遗址地层划分的科学性提



图三 沙锅屯洞穴遗址地形及洞穴堆积剖面图

出疑问，此处遗址遂被冷落。近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作了重新调查，发现此处洞穴遗址位于远离河川的山坡高处，确非古人居住地。同时在沙锅屯以西 30 余公里处的喀左县境内，发现一处时代和文化内涵均与沙锅屯相同的洞穴遗址。洞穴位置在接近峰顶的陡直山坡上，较沙锅屯洞穴所处位置更高，也更为险要。出土物为与沙锅屯遗址相同的饰绳纹夹砂灰陶直腹罐、泥质红陶双耳罐、彩陶盖盆等，部分可复原，且也出有多具完整人骨。据此我们认为，沙锅屯洞穴遗址应以墓葬为主，兼具祭祀遗址性质，所出遗物主要属新石器时代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时期，也有属红山文化遗物。所以，沙锅屯洞穴应是最早发掘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

红山后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老哈河支流英金河从南到西绕山而过（图四、图五）。红山的山体为暗红色花岗岩质，赤峰即由此山而得名。遗址分山前和山后两个地点，包含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个时代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集中分布在红山山后。1935 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在山后遗址发掘，1939 年发表考古报告书<sup>④</sup>。这次发掘和发表的材料丰富、全面，包括一批打制、磨制石器和细石器，还有较完整和可复原的彩陶器、夹砂灰陶器等，遂成为以后多年认识这类遗存的主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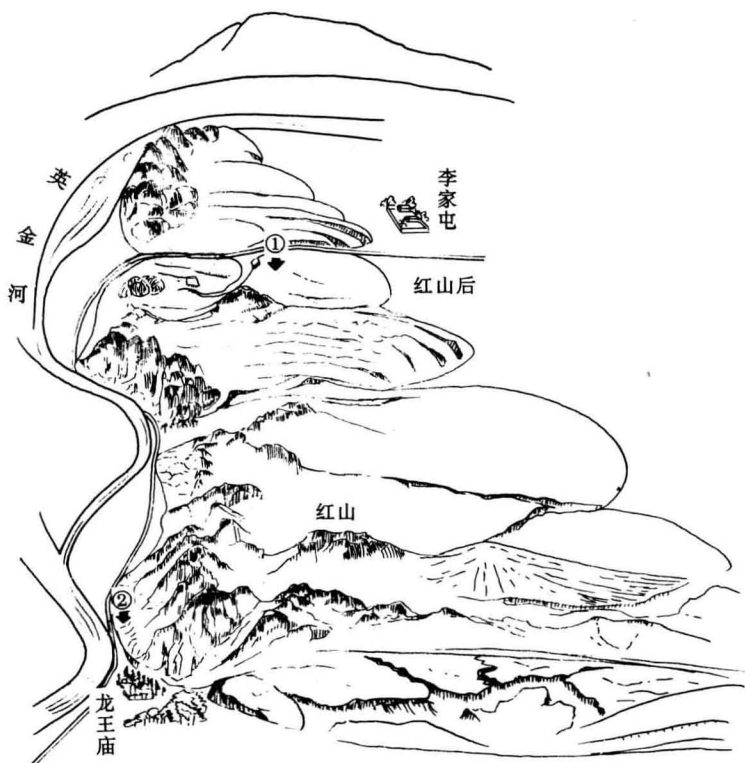
中国学者在早期对红山文化的发现，特别是在研究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

贡献。1930年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内蒙古东南部的林西县和英金河流域调查过这类遗存<sup>⑤</sup>，他和考古学家裴文中、尹达对分布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以彩陶与之字形篦纹陶共存，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具有中原与北方双重文化因素的这类文化遗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30年代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梁思永已预见到西辽河（即西拉木伦河）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应作为专门研究课题，并已注意到把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带研究的重要性。裴文中于40年代提出，沙锅屯、红山后的遗存是中原彩陶文化与北方细石器文化在长城地带相遇产生的一种“混合文化”，并设想了长城以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由北向南移动的路线<sup>⑥</sup>。50年代初，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根据正在病中的梁思永的意见，对这类文化遗存单列一章作了专门论述，进一步提出这是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文化，即仰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相互影响而在长城地带产生的一种新型考古学文化，并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认为这一文化对研究长城南北新石器文化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sup>⑦</sup>。

由于中国考古学界对这一文化的重视，新中国考古工作刚一起步，就开始了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195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吕遵谔带领下调查并发掘红山后遗址，在进一步明确这一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于1958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报告时，使用了“红山文化”的命名<sup>⑧</sup>，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调查



图四 赤峰红山后遗址远眺



图五  
赤峰红山后遗址鸟瞰图  
①②为红山文化遗存

材料中,选择了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富河沟门遗址进行发掘<sup>⑨</sup>。这是一处以细石器和饰之字形篦纹夹砂陶器为主,不含彩陶的文化遗存。它与红山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差别,是西辽河流域不同于红山文化的又一种文化类型,因此被命名为“富河文化”。以此为基础,学术界进而提出了在北方地区广义的“细石器文化”中划分不同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从中先期划分出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从而也把红山文化纳入到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这样一个大范围内进行研究<sup>⑩</sup>。此后较重要的工作有:60年代初在赤峰市西水泉发掘了红山文化房址<sup>⑪</sup>,在敖汉旗四棱山发掘了红山文化陶窑<sup>⑫</sup>。至此,人们对红山文化的面貌已有了一个基本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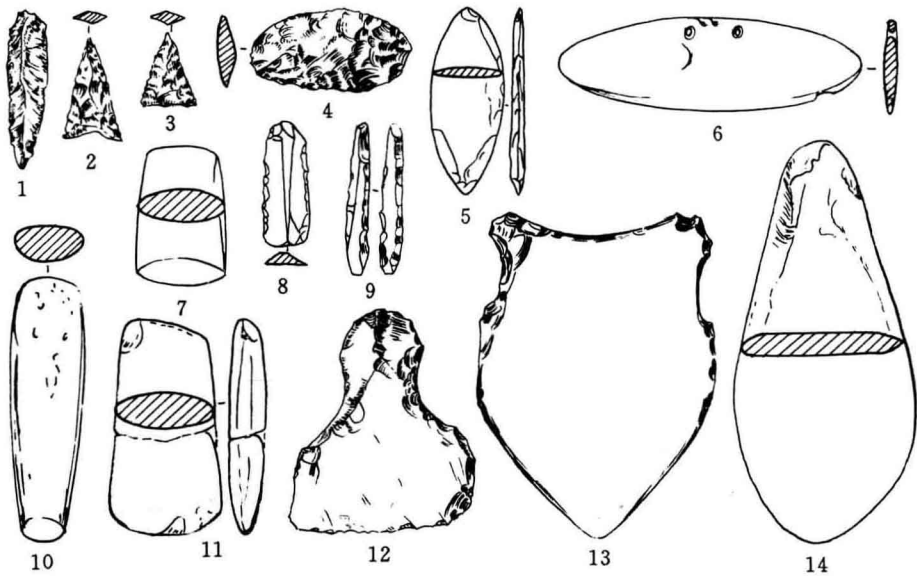
## 1. 红山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可以从石器及其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陶器与陶窑、居住址与聚落形态这三方面加以分析

### (1) 石器及其所反映的经济生活

红山文化遗址中,石器普遍发现较多,且特征十分突出。如使用量大,较其他新石器诸文化遗址明显多见,数量甚至超过陶器;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三者共存,一般以打制石器所占比例较大,磨制石器次之,细石器相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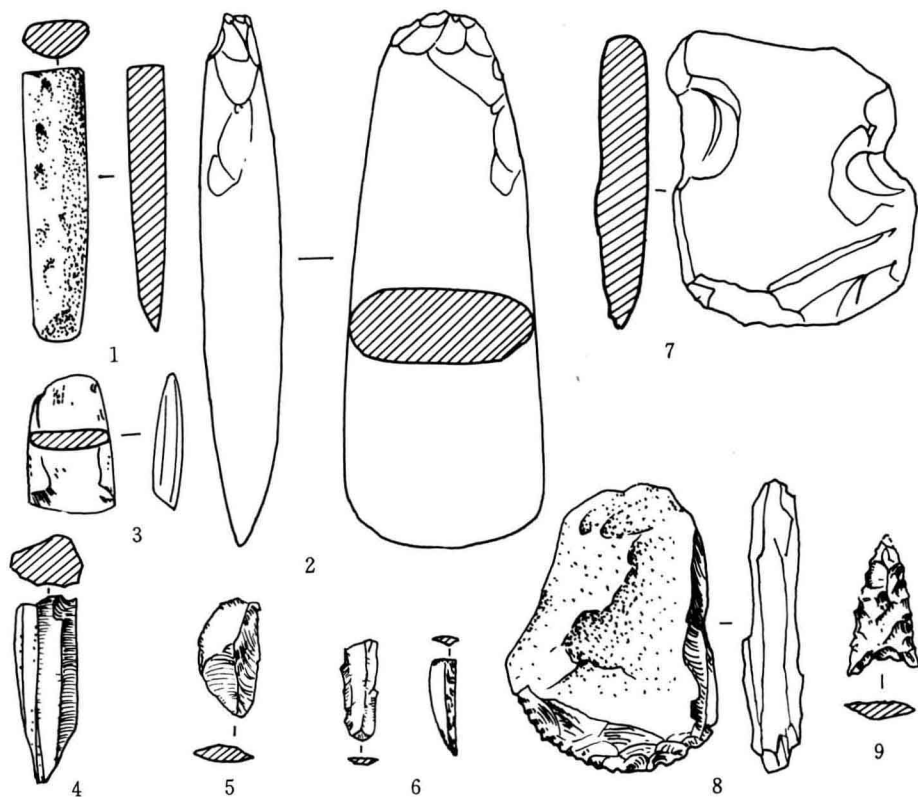
较少（图六、七、八）；大型石器多见，种类如横断面呈椭圆形、体窄长、窄刃的石斧，打制有肩的扁宽型石锄（图六：12），通体打制、四边出刃的长方形石铤，粗砂岩或细砂岩质长方体石磨盘，横断面呈半圆形的石磨棒。石耜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石器，可分两型，一型为长叶形，长度可达30~35厘米，磨制，一端从两侧打出柄部，刃部尖，刃面有条状磨痕（图六：14）。另一型较宽而短，柄端往往有凹缺，以系绳固柄（图六：13，图版91）。制作方法为打、磨并重。红山人已熟练地掌握了磨制技术，但打制技术并不因此而衰退，而是更加运用自如，其器体不仅具有磨制石器器形规整的优点，而且修打出的刃部锋利适用，又为磨制石器所不及，以至出现不少先磨好体形再打修刃部的作法，以取得锋利实用、造型规整的效果。细石器以凹底等腰三角形镞最具特征，通体加工（图六：2、3，图七：9，图版92）。



图六 红山文化石器

1. 锥 2、3. 镞 4. 刮削器 5. 叶形器 6. 刀 7、11. 斧 8、9. 刃 10. 凿 12. 有肩石锄 13、14. 耜（1~4、7~10 出自西水泉 5、11、14 出自红山后 6、12 出自海金山 13 出自五十家子）

红山文化以大型石器为主体的石器群中，与农业有关的以大型砍伐器和石耜等起土工具为主，缺少农田细作的铲类等工具，反映出当时大面积垦荒和耕作广而粗放的生产情况。体薄刃锋利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与切割皮肉有关，石箭头功能之一是狩猎。红山文化遗址发现有牛、羊、猪等家畜骨骼以及野生的鹿、獐等动物骨骼，这些都说明狩猎、畜牧占有很大比重。遗址分布区正处于



图七 东山嘴遗址出土石器

1. 石凿 2. 石斧 3. 石铈 4. 石核 5、6. 石片 7、8. 打制石斧 9. 石铈

草原森林向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遗址所处位置较高而文化堆积薄，也充分反映了这种综合经济类型所具有的定居又相对不稳定的生活状态。

## (2) 陶器与陶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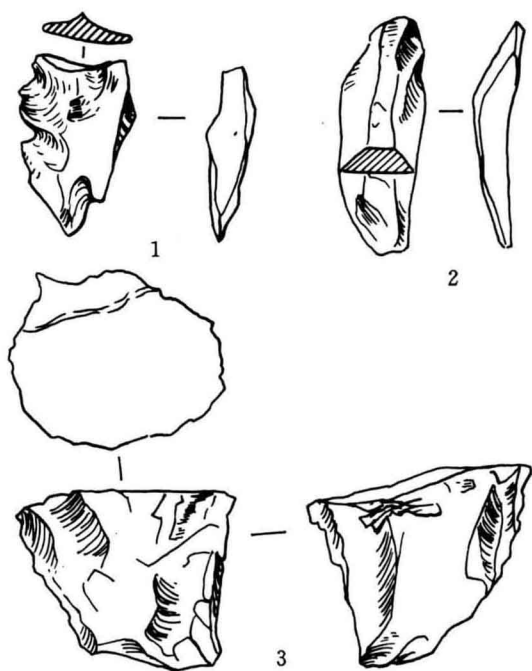
红山文化的陶系，主要为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类，也见少量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

夹砂灰陶的特点是，器形多为形制较简单的筒形罐，纹饰主要为压印之字形纹和平行线纹，由于这种夹砂灰陶饰压印纹的筒形罐也是整个东北以至东北亚地区陶器的共同特点，可知红山文化陶器具有这一大区域陶器的共性。不同的是，红山文化的筒形罐，口大底小腹壁斜直，是筒形罐的晚期形制，之字形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带与竖压横带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图九：6、7）。器形除筒形罐外，也见形制变化较多的斜口筒形器和带环形把手的器盖，表现出较复杂和进步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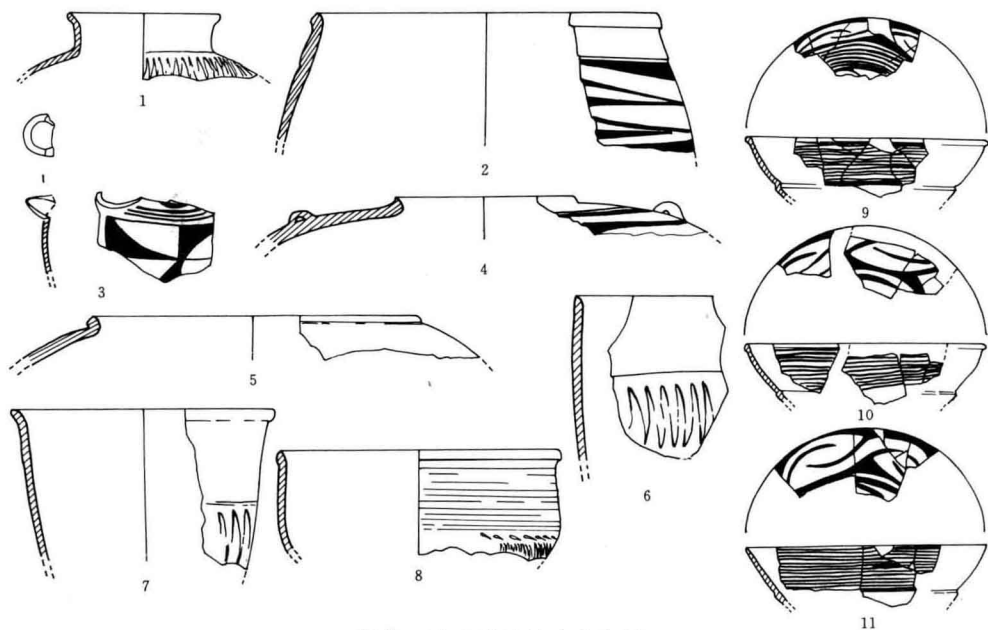
泥质红陶有粗泥和细泥两种，器形可分钵碗盆类和瓮罐类。钵有敛口式和

折肩式(图一〇:2、3),碗有“红顶碗”(图一一:3)和直口式碗,钵碗都有一些为浅腹近圜底,其时代可能较早。盆有敛口叠唇式、折肩式和鼓腹式(图一〇:5、6、7、8)。瓮罐类多双耳小口瓮和敛口鼓肩大瓮两类(图九:2、4、5)。以上诸器多素面,或磨光,大器上也有见压印之字纹的。

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一定数量,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这三种最具代表性。前者又可分为大鳞纹单元和龙身盘蜷两种表现形式。此外,还见平行斜线纹、菱形方格纹、同心圆纹、变形三角纹等,绘法严谨,笔法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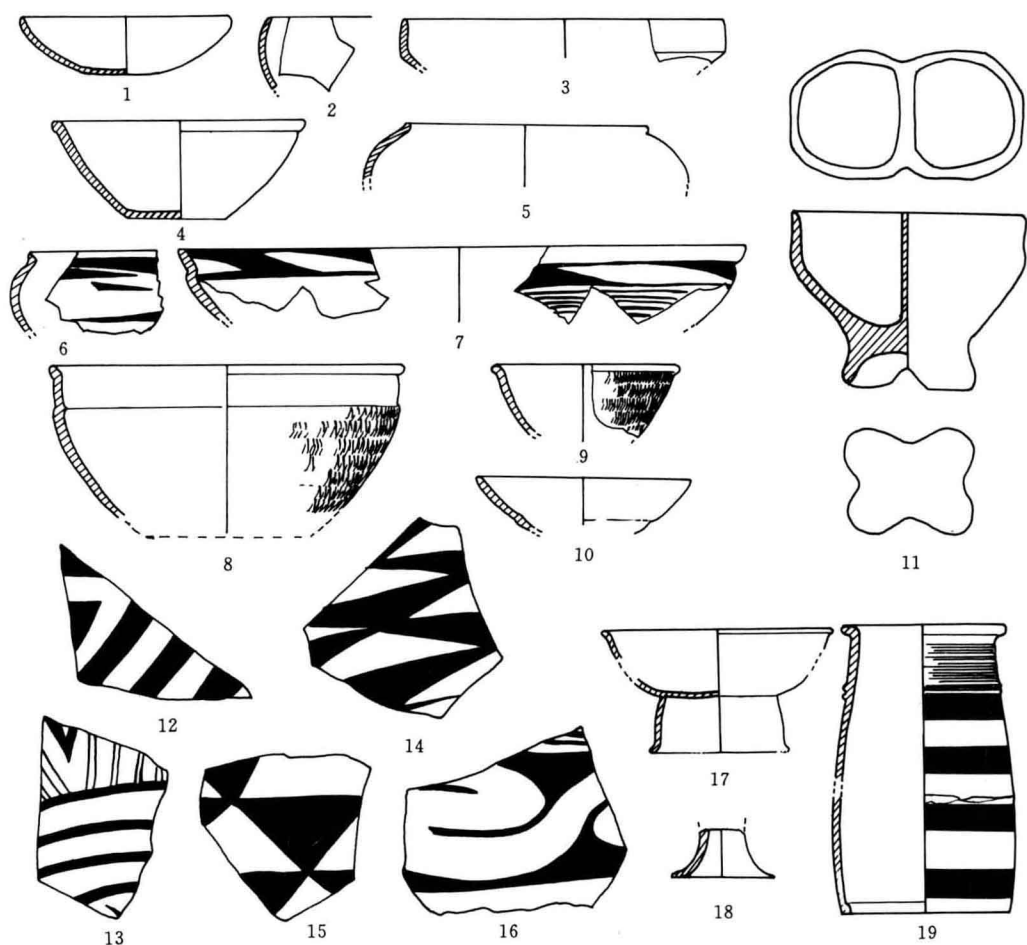


图八 牛河梁遗址灰坑出土石器  
1. 尖状器 2. 刮削器 3. 石核



图九 东山嘴遗址出土陶器

1. 小口双耳罐 2. 彩陶敛口瓮 3. 彩陶带流罐 4. 彩陶瓮 5. 大瓮  
6. 7. 筒形罐 8. 鼓腹罐 9、10、11. 彩陶双腹盖盆



图一〇 东山嘴遗址出土陶器

1. 浅腹钵 2. 敛口钵 3. 折肩钵 4. 敞口盆 5. 鼓腹盆 6. 彩陶鼓腹盆  
7、8. 折肩盆 9. 黑陶敞口盆 10. 黑陶双腹盖盆 11. 双口小杯 12~16.  
彩陶纹饰 17. 黑陶圈足盘 18. 豆柄 19. 彩陶筒形器

整,常组成整齐的带状,都是较进步的形式(图九、一〇、一一,图版 93~96)。

泥质黑陶器多为钵类或小型罐类,内外磨光,器壁厚薄均匀,唯火候欠高。这类陶器虽发现较少,却代表了红山文化的一种新的制陶工艺。

内蒙古敖汉旗四棱山发现的红山文化陶窑共有 6 座,分单室和连室两类,窑室、火膛、火道俱全。其中的双连窑室平面呈长方形,双火膛,窑柱 8 个。窑室为土石结构,为一种结构较复杂、形制较进步的陶窑形制(图一二)。尤其是这 6 座陶窑分布在 300 平方米范围内,以烧制夹砂陶罐为主,表现出红山文化的制陶业已具有较细的专业分工。

红山文化以饰压印纹筒形罐为主的陶器群,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泥质红陶和彩陶有接受仰韶文化影响的一面,也表现出自身特征。还发现有在泥质

红陶器甚至彩陶器上加饰压印之字纹的现象(图版 61),说明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相互融合程度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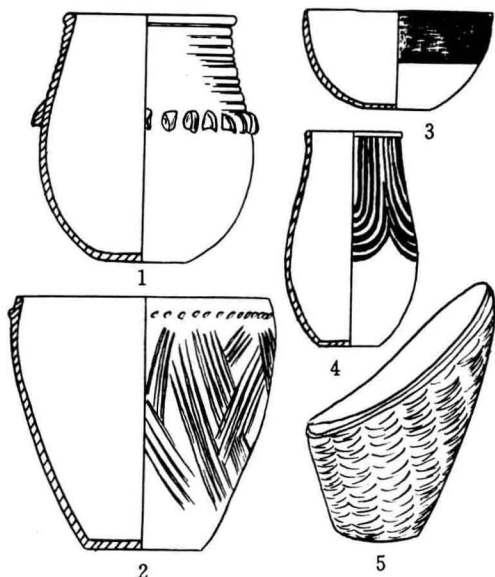
### (3) 居住址与聚落形态

从英金河流域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看,该文化聚落形态有以下特点:分布较稀疏,在英金河两岸长达150公里范围内,只分布有18处(当然这同调查的详细程度也有关系);位置在地势较高的山岗上,一般高出河床10~40米,多在山岗南坡和东坡;文化堆积薄,约0.5~2米不等,这与前述红山文化经济的多样性和定居不够稳定有关。敖汉旗新的调查材料则进一步说明,该旗境内的近500处红山文化遗址以河流为纽带分组群分布,全旗6条河组共百群,每群遗址点3~20余个不等。每群中遗址有等级之分,大遗址面积达3~10万平方米,更大的有达2~3平方公里,最大的达到6平方公里。围绕大遗址的小遗址面积4~5千平方米,形成悬殊对比。大遗址出有玉器、石钺等高级品,附近分布有积石冢、陶窑区和玉器作坊,说明已有中心聚落分化出来<sup>⑮</sup>。

已发现的红山文化房址都是对遗址作局部发掘时发现的,尚缺少房址群整体布局的完整材料。以赤峰西水泉遗址为例,其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顺山坡挖建,居住面经夯打,中央有瓢形灶址,房门朝南,有斜坡状门道,一般每边长4米,最大一间每边长10米左右,并出有成套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当反映有独立性的社会单元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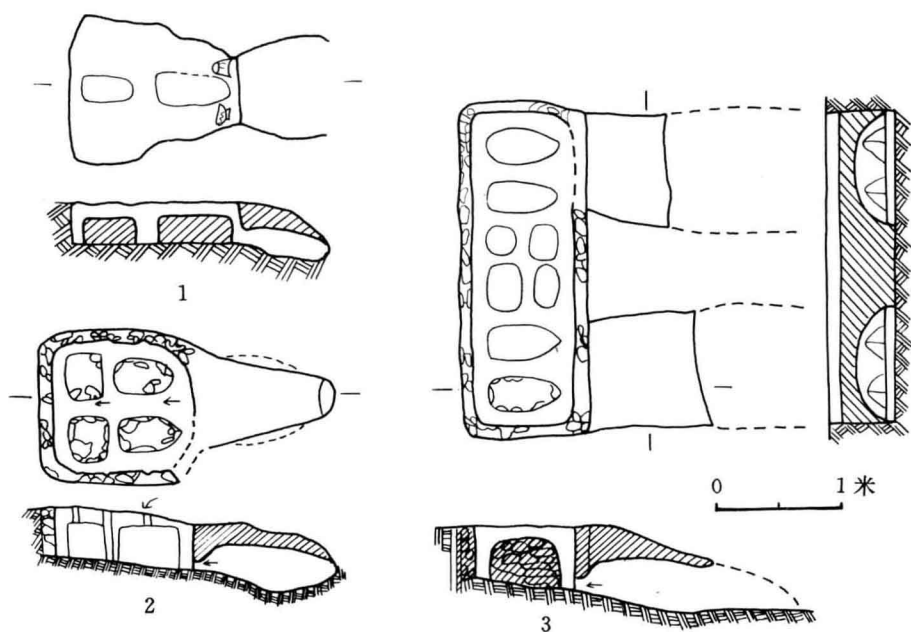
## 2. 红山文化的分布与年代

经多年调查,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已基本明确:其北界越过西拉木伦河,并有继续向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东界越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发现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相遇的现象,这里可视为红山文化分布的



图一一 红山文化陶器

1. 敛口罐 2. 直筒罐 3. 红顶碗 4. 彩陶敛口罐  
5. 斜口器 (1、2 出自小河沿 3、5 出自西水泉  
4 出自蜘蛛山)



图一二 四棱山红山文化窑址平、剖面图

1、2为单室窑 3为双火膛连室窑

西界。从分布的密度和文化特征的典型程度看，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这两河流域应是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图一）。

红山文化因至今缺少文化堆积较厚的遗址发掘和成批陶器资料，分期尚在探索中。据陶器比较分析，其早期多红顶碗一类，接近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晚期出有接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碳-14测定红山文化晚期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据此推定，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在距今6000~5000年间<sup>⑩</sup>。

### 3. 红山文化的性质

由于红山文化明显具有燕山南北双重文化特点，所以从红山文化发现之始，就多从南北文化关系角度分析它的文化性质，如40年代曾有人称之为“混合文化”，或长城南北文化接触后产生的一种新文化。60年代较为强调仰韶文化的作用，红山文化又被视为在仰韶文化影响下产生或认为就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分支。70年代以来，较为注重当地文化的自身发展，多认为红山文化应是以辽西地区独立发展为主的一种文化，同时与邻近地区、主要是中原地区关系密切。

以上概括的主要是70年代以前对红山文化的认识。由于从50年代始，中

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点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如黄河中游半坡、庙底沟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和仰韶文化两种类型的提出；黄河下游大汶口墓地的发掘和大汶口文化的提出；长江流域在成批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也先后提出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等。相比之下，辽西及邻近地区显得平静，主要是因为缺少大面积发掘和成批资料的积累。红山文化也长期被视为受仰韶文化影响的一支边远地区文化，在研究中往往一带而过。但红山文化具有南北文化结合的特点和以石耜为代表的发达的石器群仍为有识者所关注：它可能有更深的历史背景。

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出现转机是从70年代开始的，70年代至80年代初，有四项工作对红山文化研究的推动所起作用最大，即：

- (1) 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
- (2) 辽宁朝阳地区和内蒙古敖汉旗文物普查中对红山文化遗址的重点调查；
- (3) 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掘；
- (4) 1983年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座谈会。

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考定是重新认识红山文化的开始。红山文化玉器在30年代已见著录，并为海内外一些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所收藏，如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收藏的马蹄状玉箍、勾云形玉佩和玉雕龙<sup>⑤</sup>，法国吉美美术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收藏的玉雕龙和马蹄状玉箍<sup>⑥</sup>，时代一般定在商周时期或更晚，最多疑为夏代。70年代以来，辽宁西部的朝阳、阜新两市和相邻的内蒙古赤峰市文物商店仍不断收购到这类玉器，由于都是从当地群众手中收购，大都是当地近年出土的，这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对这类玉器出土具体地点和出土情况的追寻。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文化馆收集到一件大型玉龙（图版4），经调查，是在该旗的一个名叫三星他拉村的北山坡上耕地时挖出来的。这个地点在赤峰市以北100多公里处，已进入蒙古草原范围。两年以后，阜新市文物站收集到一批玉器，包括玉鸟、玉龟等，这次不仅有具体出土地点，而且有较复杂的出土状态。出土地点在阜新县化石乡胡头沟村牯牛河东岸被洪水冲刷过的断崖处。经调查，玉器出土于断崖处暴露出的一座石棺墓中，同地点还发现出有春秋时期青铜短剑的墓葬。据此，遂将玉器的年代暂定在西周到春秋之间。几年之后，1979年在凌源县三官甸子村北城子山山顶也发现了一座随葬有包括马蹄状玉箍、勾云形玉佩（图版10）在内的玉器的石棺墓，此墓虽是正式试掘，但因墓口堆积复杂，墓内未出随葬陶器，墓葬四周又为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一时对其年代难以确定。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三个地点都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它们的附近都分布有红山文化遗



址，其中胡头沟玉器墓的上部有具红山文化特征的彩陶筒形器和石墙围绕，三官甸子城子山的玉器墓上也有大量红山文化彩陶片出土<sup>⑦</sup>。虽然这几批玉器都有很大进步性，某些动物题材接近商周玉器，但它们的造型、工艺手法都很独特，与商周玉器的差别仍然是主要的，表现出较为原始简朴的作风，时代也应较早。随葬玉器的墓葬结构则前所未见，压在积石下的墓口部分堆积复杂，致使墓口不易辨认，墓内又不同时随葬作为考古断代标尺的陶器，只是出土地点和出土状态都同红山文化遗存基本相同。最终确定这批玉器的年代还需继续工作，以得到第一手正式发掘材料。然而科学是允许预见的。于是我们主要依据器物形态比较，结合出土线索，大胆推断这批玉器的时代既非商周，也非夏代，而应属于更早的红山文化。这项研究成果于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公布，1984年8期《文物》发表<sup>⑧</sup>。

考定红山文化玉器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辽宁全省开展文物大普查时期，从考古关系上进一步确定这批玉器与红山文化的关系自然成为有关市县文物普查的一项重点工作。此前，红山文化遗址大都是在与辽宁西部相邻的内蒙古赤峰市发现的，而辽宁西部各县掌握极少。记得1972年在喀左县鸽子洞发掘旧石器时代遗址时，在附近山坡上采集到红山文化彩陶片，曾一时视为珍奇。这次普查，在凌源、喀左、建昌、建平、朝阳、阜新、彰武、康平等地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上百处，内蒙古敖汉旗发现400余处，东山嘴、牛河梁遗址都是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东山嘴遗址并出有玉器，牛河梁遗址更是因寻找玉器出土地点而确定的。大批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确定这批玉器的考古关系提供了条件，于是在这次普查的后期，对新发现的东山嘴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sup>⑨</sup>。

这是在辽宁省境内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发掘，收获却出人意料，因为这处遗址与一般居住遗址有很大差异：

(1) 遗址的位置虽在大凌河川北岸，距河岸百余米，却坐落在一山岗顶部正中，隔大凌河开阔的河川，正对河对岸的大山山口，地形选择居高临下，十分讲究气势（图版85）。

(2) 全部为石砌建筑址，北部为一每边长10米左右的正方形建筑址，南部为一直径约2米的圆形坛式建筑（图版86），两侧砌石分别与中部保持等距，形成以南北轴线分布、南圆北方、左右对称的一组完整建筑群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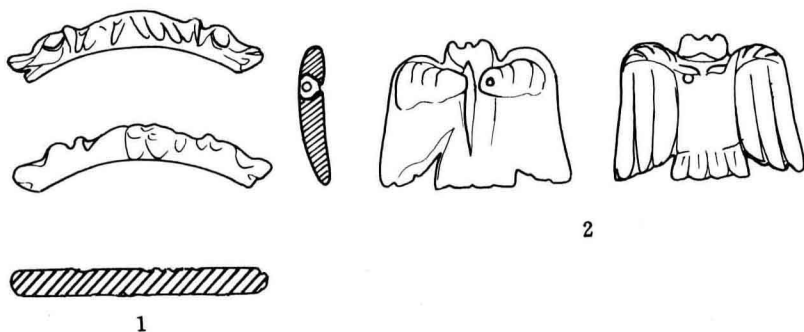
(3) 出土一批特异型陶器，如无底镂空瓶形器（图版100）、内外绘彩的盖盆、黑陶圈足盘、三足小杯等，尤多无底筒形器，显然它们都是非生活用具。

(4) 尤其是出土有陶塑人像群，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型的相当于真人的三分之一。塑造较精致的两件出土于圆形坛式建筑东侧，为人体上、下部残件



各一块。上部残件为双臂交叉，左手握右手腕；下部残件为双腿盘坐，右腿压在左腿之上（图版 87）。从陶质、大小比例和出土时叠摞在一起的情况看，应属一尊人像。塑造技法追求逼真，突出女性特征并富于动感，当是一尊女神塑像。小型的有两件较完整，皆无头，倚坐式，腹、臂、大腿、阴部有突出表现，当为一件孕妇塑像（图版 88、89）。

(5) 遗址也出有玉器，一为双龙首玉璜，一为绿松石鸮形饰，皆形体甚小，雕工精致。其造型取材一兽一鸟，龙首长吻，接近三星他拉大型玉龙的首部，已是比较成熟的龙形象（图一三，图版 25、28）。



图一三 东山嘴遗址出土玉器

1. 双龙首玉璜 2. 绿松石鸮形饰

显然，东山嘴遗址非居住址，而是一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群址。这样，从玉器的确认到东山嘴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红山文化内涵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说 70 年代以前对红山文化的认识限于石器、陶器、房址、陶窑等史前文化一般内容的认识而不引人注目，那么新增加的石砌建筑群址、神像群、玉器群，则为同时期中国诸史前文化所不见或罕见，却多是世界各地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从此，红山文化出现异军突起之势，考古界把史前文化的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扩大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出现转机的时期，正是考古界提出考古学文化划分区系类型理论前后。红山文化分布区所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已被列为六大考古文化区之首，对红山文化的新认识也引起了对这一考古文化区的进一步注意。继 1982 年在河北省北部蔚县三关遗址召开考古现场座谈会之后，1983 年 7 月以“燕山南北地区考古”为题的考古座谈会在朝阳召开。与会学者在考察了东山嘴遗址和出土文物以后一致认为，这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址，陶塑妇女像更是“考古界等了三十多年的重大发现”<sup>②</sup>。苏秉琦先生在会上高度评价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我国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